

国粹“接地气”恰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玉渊杂谭
杨 仑

戏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从徽班进京算起,京剧、越剧、评剧、黄梅戏都曾深受人们喜爱,却又在时代的浪潮中陷入低谷。近日,一部以京剧为主题的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却出人意料地博得了年轻观众的喜爱,重新掀起了京剧带来的文化热潮。

如今在电视剧市场,如何在原汁原味保留几百年历史文化积淀和精华的基础上,以更适应现代人视角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直是以国粹文化为底色的影视剧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虽然不少电视剧中喜爱融入戏曲元素,但影视圈很少有人敢碰戏曲

题材剧。资深制片人张雅曾直言:“带有京剧元素的电视剧有文化内涵,但真的拍一遍梨园行的大剧特别难,因为是国粹,博大精深。”

以传播学的视角看待,戏曲的兴衰与媒体技术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早在百余年前,谭鑫培就曾利用当时的先进技术拍摄了电影《定军山》,80年代的评书风靡全国,依赖广播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曾被认为已经衰落的相声,则借助网络流媒体的兴起焕发了勃勃生机……

事实证明,无论是京剧、地方戏还是语言节目,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是祭死胡同。传播是曲艺获得受众的根本,有了更广泛的受众,才能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因此,接地气儿、下神坛,适应全新的媒体形

式,利用最新的媒体技术,才能走出属于曲艺发展的新天地。

以戏曲为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戏曲形成了完整、体系化的文本即表演范式,一颦一笑、一腔一板都容不得半点差错。这固然是对艺术、作品打磨的极致追求,但适应新兴媒体技术与之并不冲突。

相声也是如此。德云社捧红了多位相声演员,年轻的观众甚至能整本成套地唱出传统文化韵味浓厚的太平歌词,令人感慨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如此有魅力。

事实上,戏曲曾经是最佳于利用媒体技术的艺术形式之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刚刚诞生的唱片是彻头彻尾的新生事物。面对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播放形式,一批京剧名角儿率先“吃螃蟹”,马连良更

是将新编剧目直接录入唱片,获得市场反馈后才回到传统舞台表演;梅兰芳则对电影抱有极大的兴趣,参演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

由此可见,利用新兴媒体技术称得上戏曲的“传统艺能”。在通信技术大变革的时代,类似的尝试不胜枚举。在短视频平台,有大批京剧、地方戏青年演员进驻,几十秒的精彩唱段、视频直播中的现场表演,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让大批青年观众领略到传统艺术之美。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自信恰恰来自对传统中精神内核的自信,而不是良莠不分的散带自珍和文化迷信。戏曲走下神坛接近了“灶台”;接地气儿的同时也接了“人气”。可以说,传统戏曲已经开始走上了新的征程。

蓝天下 爱鸟,不只在这一周



丝光椋鸟取食地果 孙戈摄

孙 戈

每年的4月1日—7日是北京市的爱鸟周。爱鸟周源于1981年,最初为保护迁徙于中日两国间的候鸟而设立;1992年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中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各地爱鸟周的时间都不尽相同,但都在四月初至五月初这段时间。

设立爱鸟周的初衷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大多数鸟类都以昆虫为主食(至少也是在育雏期以昆虫为主食),是调控昆虫数量、抑制害虫暴发的主要力量。不同种类的鸟,取食的昆虫也不一样;比如山雀类翻拣树皮,柳莺类搜刮树叶,鹞类在树冠拦截飞虫,雨燕在空中追击,而啄木鸟则深凿树干。而且与农药相比,鸟类对害虫的防治不但高效可持续,而且自然无污染。

在DDT等烈性杀虫剂被滥用的年代和地区,害虫在经历短时间的数量锐减后,很快进化出抗药性;反倒是鸟类被毒杀殆尽,导致生态失衡,害虫失控,适得其反。而有些猛禽类,特别是猫头鹰,则是捕鼠量最大的食肉动物类群,有效地控制着鼠类的种群数量。在我国西部牧区,人们甚至会设立鹰架,主动招引大鸮和猎隼等猛禽前来筑巢和停憩,以提高它们的数量,防治鼠害。

食蜜鸟类,如太阳鸟、啄花鸟、绣眼鸟等,可以为植物传粉;特别是对于冬季开花的植物更为重要,因为此时昆虫还未出现。在南美洲甚至有很多种花朵与不同种类的蜂鸟协同进化,只允许这种鸟替它传粉,而将蜜蜂蝴蝶等昆虫拒之门外。食果鸟类会将未消化的种子在异地排出,帮助植物扩散和森林更新。在某些热带森林,高达92%的树木都要靠鸟类来传播种子。

在瑞典,人们计算过,一只松鸦通过四处掩埋种子所达到的植树造林效果,如果改用人工完成,需要花费2450—11250美元。而秃鹫和乌鸦等食腐鸟类可以快速清除死尸,避免疾病暴发;尤其可以避免尸体滋养流浪狗导致的狂犬病暴发。

西班牙曾统计过,兀鹫可以为国家每年节省至少100万欧元的病死牲畜的处理费用。此外鸬鹚等食鱼鸟类会在林间大树顶上排泄,促进河流和陆地之间的物质循环。比

如阿留申群岛在引入赤狐后,在此繁殖的海雀等海鸟被捕杀殆尽;没有了海鸟们营养丰富的鸟粪的滋养,岛上的植被很快便从富饶的草原退化为贫瘠的苔原。鸟类每年的大规模迁徙甚至促进了各大陆之间的营养流动和物质循环。

鸟类还是多样性最高的陆生脊椎动物类群。目前全球共有10770种鸟类,分属于40目250科2322个属。中国2017年最新版名录共记录有1445种,分属于26目109科497属,其中93种为在我国特产;总鸟种数位列世界第八。

不同鸟种依赖于不同的生境,比如有些喜欢农田,有些喜欢高草丛,有些喜欢新生的幼年林,有些喜欢原始未被破坏的成熟林,有些喜欢未被污染的溪流,有些喜欢裸露岩石滩;因此不同类型的鸟类的多寡,可以反映不同生态类型的面积和分布格局。而且鸟类在野外易于辨识,大部分仅凭声音就可判定种类;昼行,活泼,便于观察计数。因此鸟类是环境监测最理想的指示物种,一个地区的鸟类多样性可以直接反映该地的环境健康状况。

同理,保护鸟类多样性,也必然要维护鸟类的生境。许多举措比如保护原始林、维持林下灌丛、保护湿地、维持自然堤岸、打击盗猎等,也间接保护了该地区整体的生态环境,从而造福人类自己。

随着观鸟业蓬勃发展,鸟类现在也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比如,芬兰2017年观鸟业产值46亿欧元;哥斯达黎加全国旅游收入的41%都来自观鸟业;2016年美国共有约4510万人参与观鸟,产值超过25亿美元,其中1630万人专门为观鸟而旅行。我国目前观鸟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云南、广西、四川、河南、海南等偏远山区,很多村庄正靠着观鸟业发家致富;他们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鸟人提供向导、食宿和体检服务。

但根据IUCN统计,全世界约23%的鸟种濒临灭绝。由于很多鸟类的迁徙特性,鸟类保护与其它动物的保护不尽相同,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因此我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签订候鸟保护协议。爱鸟周在每年春季各地候鸟北返高峰期举行,正是为了加强大家保护鸟类的意识。

(作者系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助理研究员)

摄手作

捕捉闪电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陈设广摄



图片4月1日拍摄于广西南宁



北上广老宅：摩登城市里的旧时光

博览荟

张 迪

电视剧《安家》的热播让话题“上海老洋房”拥有超过4亿的阅读量。其实,我国有三种特殊的宅院:北京四合院、上海老洋房和广州西关大屋。按照《安家》剧中的说法,这三种类型的宅院对房产中介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三年不开单,开单吃三年”。那么,它们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上海老洋房:梦回上海滩十里洋场

有人说,城市是有生命的,老建筑就是城市的记忆。老洋房是上海经典的建筑物,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花园别墅融入半个多世纪前建筑师的心血,有的还融入了中式建筑的风格,大多有着显赫的时代背景,或是诗情画意的浪漫故事,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不仅是城市的亮点,更成为一种时代符号。

华山路849号的丁香花园,就是这样一座中西结合、带着浓郁的海派气息的豪华建筑,像极了华洋杂处的上海。它的大门不是很显眼,从外边看上去是风格独特的三层别墅,红白相间的色彩以及木柱敞廊式的格局让整幢房屋显示出强烈的视觉吸引力。里头却有中式山水、亭台楼阁,一汪碧水倒映满目苍翠,有种时过境迁的错觉。

这座花园的主人赫赫有名,是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丁香花园园内有两幢楼房,如今称为一号楼和三号楼(二号楼为20世纪50年代兴建),出自美国著名建筑师艾赛西·罗杰斯之手。据传园内的丁香花是李鸿章亲手栽种,故命名为丁香花园,每到春暖花开之季,香气袭人。

在20世纪初,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曾吸引无数外国淘金者来此寻梦,并因此留下各式各样充满异域风情的老洋房。位于上海静安区的马勒故居,现在的衡山路勒勒别墅,就是一所挪威风格的城堡式别墅。别墅的主人赛姆·马勒是一位英籍

犹太人,在上海创办了赛姆洋行,代理航运业务,后来又自己购置船只开展运输。

据说有一天晚上,马勒的小女儿梦见自己拥有了一座“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第二天还用画笔将这座城堡画了下来。马勒先生看到这幅画觉得很有意思,便真的雇用设计师按图建造,用了7年才完工。这座洋房如同童话里的城堡,远远望去,那高尖陡直的屋顶、棕红色的砖墙和半透明的彩色玻璃,和童话故事里描绘的一模一样,仿佛一进门就能遇到冰雪皇后或是豌豆公主一样。

北京四合院:处处透着中式生活美学

在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旁的一条僻静的小巷护国寺胡同里,坐落着一座灰砖四合院,它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故居。该院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院,带西跨院落,18世纪后半叶曾是一座清代王府的一部分。1951至1961年,梅兰芳在护国寺9号的四合院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0年。

居高临下望北京,除去皇室建筑群是一片黄瓦之外,四周都是灰色屋顶和其中的绿树顶。现存的民居建筑,多是明清两代的遗物,几乎全是属于四合院系统的平房住宅。“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按照北京建筑行业的传统,四合院是专指具有东西南北四方的建筑组合,这和近年常使用的“四合院”一词不是同一概念。正规的四合院,方位应是坐北朝南(因地形或所在街巷位置等条件所限,朝向不同的也不少),平面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大门位于宅院的东南角“青龙”位上,显示出主人的身份地位。

作为民居,四合院给人最直接的感觉是浓厚的生活气息,庭院方阔,大小合宜。清代有句俗语形容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可以说是四合院生活比较典型的写照。有的四合院院中还栽花置石,一树海棠花配以石榴盆景,大缸养的金鱼寓意吉利,把大地拉近人心,处处透着中式古典生活美学。

梅兰芳故居中心院落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柿子树。夏天,家庭成员和客人通常会把桌椅从周围房内搬到院中,抄手游廊把庭院分成几个自然的空间,但分而不隔,虚实虚实,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是封闭式住宅,自成天地,家庭成员在这里享受美好的阳光与宁静的夜晚,其乐融融。

广州西关大屋:使用就是最好的保护

相较于北京四合院和上海老洋房,广州西关大屋并没有它们名声响亮,很少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看到它们的身影。西关大屋是清末广州富商大户在广州城西关地方兴建的住房形式,是广州传统民间建筑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在西关角一带最多。西关是指当时西关区内靠西边的一个角落地段,东起文昌桥,大观桥,西至泮塘、昌华园一带,形成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

广州西关在宋代为绣衣坊,据说那时,城西纺织及成衣手工业已有发展。到了明代,西关区已成为广州城的商业中心地带,而十八甫作为西关最早的商业区,从明朝发展起来,沿西濠西岸及西关涌(大观河)两岸,18条商业繁盛街圩。清代以后,由于十三行的兴起,西关兴建了机房区,西关的“三宝”(即宝华路、宝源路、多宝路)加上逢源路,即为西关大屋聚集之地。

据专家研究,最豪华的西关大屋有七

进深,里面客厅、小厅、书轩,还有花园。可遗憾的是,广州的西关大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所剩无几,目前在广州已经找不到一座完整的西关大屋,要想看真正的西关大屋,只能到澳门去看卢家大屋。

北京四合院、上海老洋房和西关大屋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豪宅,一般豪宅只要面积够大、地段够好,开发商够背景就行,是赚了第一桶金的有钱人置换首选,有花园或者露台。但老洋房、四合院和西关大屋是收藏级别的,是稀缺中的稀缺,产权清晰,可供出售的更是凤毛麟角,有钱未必买得到。

一代一代的人过去了,房子作为承载过这些人的空间,也见证了故事本身,从而具有了生命力。因此,有专家认为对老房子最好的保护不是博物馆式的呈现,而是还原其最基本的功能——住人,因为使用就是最好的保护。

比如,坐落于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上的荣宅,就从过去的私人宅院变身上海文化地标,建筑文化遗产因此重获新生。荣宅原先是荣氏家族的故居,已经走过100年的历史。1918年,“面粉大王”荣宗敬买下用来居住,本身就是一座建筑精品。2011年开始,普拉达(法国奢侈品品牌)花了6年时间修复荣宅,百年老宅焕然一新,往日风华扑面而来,是海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这两年,荣宅相继举行过各种艺术展,成了社交网络上最热门的沪上艺术地标之一。



上海丁香花园 张迪摄

杨·瓦奈克： 不识字的波兰航空先驱

科学史话

武夷山

波兰是个国土面积只有313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只有3840万。但是,这个“小国”诞生了哥白尼、居里夫人、肖邦等不少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大人物。

根据西方世界的公认说法,世界上最早造出实用滑翔机的是德国工程师奥托·李林塔尔,他于1891年制成一架蝙蝠状的弓形翼滑翔机,成功地进行了滑翔飞行。但波兰的杨·瓦奈克于1866年就造出了滑翔机并进行了滑翔飞行,比李林塔尔早25年。应该说,瓦奈克也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先驱人物之一,但世人知之甚少。更遗憾的是,由于他是文盲,未能留下任何关于其滑翔机制作的文字记录和图纸。

瓦奈克于1828年生于波兰塔尔努夫省栋布罗瓦附近的卡佐夫卡,他父亲是农奴。小瓦奈克没有上过学,似乎也只能走终生务农的路。后来,他拜师学木工手艺,成为手艺娴熟的木匠,改变了一生的职业走向。

除了木工技艺,他还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他具有细致的观察力,看过一幅画后就能凭记忆将其大致复制出来。奥德波利什佐夫村教堂的斯坦尼斯拉夫·摩根斯滕神父十分赏识瓦奈克的才华,在他的热情鼓励下,瓦奈克为克拉科夫市和奥德波利什佐夫村两地的教堂创作了大量宗教题材的木雕和石雕。人们评价说,他创作的天使雕塑的翅膀“极其美丽”。如今在克拉科夫民族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他的一些雕塑作品。另外,奥德波利什佐夫村建设了一个杨·瓦奈克博物馆,专门陈列他的艺术作品。

瓦奈克心灵手巧,多才多艺,曾改良过当

时的农业机械,也在乡村戏剧中扮演过角色。

瓦奈克有一个飞翔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仔细研究过飞禽的翅膀。他注意到,有些鸟类善于利用上升气流飞到很高的高度。弄懂了这个道理,他后来就知道如何挑选适合滑翔飞行的天气。据说,他制作过好几个滑翔机模型。他不懂气动力学理论,但他知道模仿鸟翼的弧度曲线来制作滑翔机机翼。

1866年,瓦奈克开始制作第一架滑翔机。他用白蜡木制作滑翔机的机身,覆以涂了清漆的亚麻布。他给这架滑翔机起名为Loty(波兰语“飞翔者”的意思)。这架无尾翼滑翔机的翼展约26英尺(7.9米左右),滑翔机由控在翼肋后缘的控制索来控制,滑翔机驾驶员通过踩脚踏来控制控制索。当年6月间,瓦奈克操纵这架滑翔机从一座小山上升起,成功地进行了滑翔飞行。

试飞了几次之后,他信心大增,就请求斯坦尼斯拉夫·摩根斯滕神父的恩准,让他修一条活动坡道到教堂钟楼顶上,以便从钟楼上驾驶滑翔机起飞。这个钟楼本身的高度为45米,教堂建在50米的山上,总高度就有95米。从钟楼上起飞向山谷里滑翔,条件相当好。坡道建成后,瓦奈克在宗教节日、狂欢节、欢庆新年等场合进行过多次滑翔机飞行表演。克拉科夫民族博物馆馆长塔德乌什·塞韦林斯教授称,波兰的一些教会档案记录下了瓦奈克的飞行活动,但那些档案未获得第三方审查验证。迄今,除了波兰,其他国家的人很少听说过瓦奈克在航空领域的成就。

1869年5月16日这一天正是圣灵降临节(即复活节后的第50天),瓦奈克再次为奥德波利什佐夫村的狂欢节活动进行滑翔机飞行表演。不料飞行中出了故障,他摔成重伤,两个月后去世,年仅41岁。